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 主编

甘怀真 著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
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 主编

甘怀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
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甘怀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846-5

I. 皇… II. 甘… III. 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D69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555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27 号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著 者 甘怀真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王春琴
责任校对 赖芳斌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2
印 张 27.5
字 数 39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846-5/B·386
定 价 4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社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再版感言*

本书得以再版,并改由台湾大学出版,必须感谢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再次将本书编入“东亚文明研究丛刊”。由于本书甫于去年二月出版,故除了校订错字或再润饰语句外,没有再修订。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创立于2002年11月,是台湾为了发展所谓研究型大学所设立的校内一级研究中心。该中心之所以设立于台大的原因之一是延续2000年所推动的四年期“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中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该计划尝试从诠释学与东亚史的方法与观点,重新探索儒学的传统。而我负责其中一项子计划“德川时代日本关于中国礼学的诠释”。在研究计划的分工上,一方面负责日本儒学,尤其是礼学部分;另一方面探讨历史上权力、制度与经典诠释的关系。该计划已于今年三月执行完毕。依据台湾执行研究计划的规定,都必须缴交研究成果报告。其实一个好的人文学研究的计划,不是去宣告一个定论的产生,而是发现更多研究的可能性。如果我所执行的日本江户礼制的研究计划有些许意义,主要在于尝试以不同的观点与方法,更细致地讨论权力、制度与知识间的复杂关系与其所建构的历史现象。这一年多来,为延续该“追求卓越计划”的研究动力,我也在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申请并执行“东亚历史变迁中的权力与经典诠释”研究计划,同时设立“权力与诠释论坛”的网站(<http://ccms.ntu.edu.tw/~kan/power>)。这几年的研究工作若有所谓成就,主要是能

* 按:这是本书2004年6月在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再版时作者所写的感言。

够集结一批同道，在学术研究的路上一同探索。这本书只是这个探索的初期报告，故其中不成熟以至谬误处势所难免，请方家多宽容并指教。

这一年来的生活多困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草创之初的繁琐行政工作。虽经常身心疲惫，但也更觉东亚研究的展开可为现在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新的视野、方法与理论。或许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能为学界带来一丝新的气象。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质疑甚至否定东亚研究，我们也愿意与这些学者进行良性的辩论。真理是否愈辩愈明，我没有信心。但人文学研究也不是探寻什么真理，而是发现事实的多样性。至少我相信辩论可以发掘事实的多种面向。我也深切期待台湾能出现这样一个好的学术环境。

最后，再次感谢为这本书付出心力校对、排版的诸位朋友：郑雅如小姐、赵立新先生、陈亿芳小姐、江秀姿小姐与陈沁琇小姐。没有他们的协助，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

甘怀真

2004年6月16日于台大历史系研究室

自序：兼论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展开

我将近年来所撰写的论文，有曾在期刊、会议论文集出版者，也有未出版者，皆作补充校正、适度改写并统一体例，集结成此书，名为《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其中所谓“古代”，是因为本书所研究的时代，其上可推至春秋，下至唐代，故泛称此时期为中国古代。又如题所示，皇帝制度、礼制与儒家经典诠释等历史学相关课题是全书的主题，也是我长期关怀的课题。借着出书的机会，谨就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相关问题，略陈己见，就教方家。

扣紧本书的课题“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政治秩序”而言，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不是仅靠来自皇帝阵营的暴力，也包含人民方面对于此政治秩序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认。故皇权必须有“公权力”的成分。此公权力须通过制度性的媒介而获得社会的承认，且此公权力所蕴涵的文化理念也须是被支配者认为有利于其社会生活。这类的思考引发了“从社会到国家的转向”。长期以来，学者想从社会结构（包括经济）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国家，其后逐渐转向法制、礼制的层面。于是广义的政治史研究引入“意识形态”、“正当性”等概念。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史研所的研究生，开始有关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即受到这股学风的影响。因为礼制是研究国家意识形态与正当性的最好材料。

这类讨论多认为作为意识形态或国家正当性的文化只是真实的物质利益与权力关系的反映，或作为工具与装饰品。即统治者借由一些文化符号以装饰并传达己身的权力。然而，权力本身为何，却是不证自明的，即使没

有这些文化内涵，亦可成立。此预设也奠基于人们相信所谓“普遍人性”。故由此推论即使身处不同的时空脉络，人们对于权力的认识是一样的。但这种“普遍人性”说是源于近代以来西欧学者在其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的自我认识，推而及于非西欧的世界。

这类的“普遍人性”毋宁视为近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特殊人性，其中对于权力的认识也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特殊文化。然而，许多研究也证明文化本身即蕴涵权力，不只是权力的工具而已。权力本身是一种人为的文化建构，而非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在不同的时代、地域有不同的权力观念。

我的博士论文《唐代京城社会与士大夫礼仪之研究》即受上述学说的启发，认为礼制中的诸符号不只是政治权力的反映、工具与装饰，其本身就是权力。在此试举一例以说明之。白居易在其著作《琵琶行》中，自述其被贬到江州的寂寥心情，对于当时华北士人而言，江西地区是一蛮荒之地。有一次白居易与友人在浔阳湖畔举行送别会，这应该是江州的区域性士大夫的社交活动，从诗文与当时的“本籍回避”政策也可以推测这些士人应多来自北方，故“同为天涯沦落人”。此送别会原只是例行迎来送往的活动，诸人兴致不高。却在即将结束时，突然间听到有一位妇女在弹奏琵琶，受乐声吸引，这群士大夫决定“续摊”，所谓“添酒回灯重开宴”。即使白居易以其高超的文学素养描述了这位乐女的精湛琴艺，但令他真正感动的原因更是她所演奏的是长安宫廷音乐。这种音乐所造成的氛围使白居易沉溺于过往长安生活的回忆。对照于此，如今从长安被流放到边疆，对于白居易而言，是从文明下放到野蛮。白居易不只是心理抗拒，生理的感官能力也大幅下降。白居易说他听到长安宫廷音乐使他“如听仙乐耳暂明”，即当地野蛮人的声音造成他的耳朵好像失聪。这批士大夫其后都“掩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被“文明”所抛弃。

在古代中国，当官以进入政治界当然是为了获得权力。然而当时权力的主要内涵之一，是士人可以借由此管道以进入“士大夫社会”，参与其中的各项礼仪活动。借由这些礼仪的实行，士大夫获得了身份的荣誉感，进而感受到己身的权力。换种说法，权力是必须借由礼仪符号以展示。以上举白

居易之例而言，一旦一位官员被迫从朝廷离开去担任外官，也就离开了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士大夫社交圈，无法在这类高级社交活动中，借由我群团体成员间的礼仪实践与文化符号的交换以建构并确认彼此的士大夫身份。这些礼仪与文化符号包括各种教养表现，如作诗、语言、仪态、服装、舞乐、宫殿等。一旦士大夫身处所谓蛮荒之地，就没有了上述诸礼仪符号，也就失去了在士大夫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借由礼仪符号的交换以建构主体的条件，亦即丧失了士大夫身份感，也因之失去权力。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观察并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政治史除了探究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与战争、暴动为中心的政治斗争之外，更应将注意力及于人际间的权力关系。权力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文化现象，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通过人际关系的缔构，以确立自身主体的地位，并借此确认或扩张其权力。若要理解一个人的权力，应分析其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流动。以皇权而论，若不能将皇权置于“君臣关系”的社会脉络中理解，探究君、臣各自在彼此的人际关系中的互动，就无法界定皇权的性质与大小。故本书在探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将焦点集中于“君臣关系”，且认为君臣关系并非以专制政治之下的“君尊臣卑”的刻板印象可以完全理解的，“家父长制”等类型学的概念工具可以提供我们研究的凭借，但不应该决定我们研究的答案。

多年来我也以礼学研究为基础，探究“儒家经典诠释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此亦为本书的另一主题。自2000年起，我参与“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的大型研究计划中的一项子计划“德川时代日本关于中国礼学的诠释”，尝试以中日礼学之比较为研究范畴，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秩序（尤其是皇帝制度与天皇制）与儒家经典诠释（尤其是礼学）的关系。虽然此计划仍在进行，日本历史的研究也仍在开展中，但借此机会，我能更进一步反省此课题的复杂性，并且能学习西方语言学、诠释学的若干理论与方法，十分有助于我长期以来所从事的中国“儒教国家”研究的观念厘清。

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一大主题：传统儒教国家，尤其是儒学与专制政治的关系。基于学术立场、政治理念或个人信仰，学者争论儒学究竟是否应

为传统专制政治负责。某些研究将儒学视为一块铁板，认为它自先秦以来即有固定的内容与确定的方向。就哲学而言，实情是否如此，笔者非专家，另当别论。但就儒学作为一种“政治论述”而言，并非有固定的内涵，须视历史中的行动者如何理解其所处的历史脉络，根据其意志，并受其策略影响，对于具有共识的儒家经典，作出“经典诠释”。这类通过经典诠释以建立“政治论述”，行动者当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对经典作出任意的诠释，也受限于当时的学术传统、知识范畴与内容条件。然而，历史中的行动者对于现实的理解与理念，以及其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为达成特定的目的所采取的策略，都影响了其经典诠释的结果。无论如何，政治原理都不是直接从经典而来，而是经过经典诠释的媒介。而且经典中的语言、符号虽然不能任意诠释，却经常是行动者在建构其政治论述的工具。

本书探究了春秋战国到唐代之间，儒者如何利用儒家经典中的语言符号以建构一套政治论述，用以在现实的世界中进行政治斗争，以建立其理想的儒教国家。如本书的“上篇”讨论儒家“礼”观念的演变，欲说明礼作为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其观念的主要内涵却不断变化。儒家经典中的政治学说诚然提供了儒者行动的依据。西汉中期起，儒家经典中的语言更是政治行动的正当性的来源。然而，本书试图证明，儒家的政治学说主要是战国中期以来，儒者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了儒家经典中的文本与符号，以建构符合其意志与策略的学说。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儒家经典提供了历史中的行动者想象上的文化资源，无论这些人是正读抑误读，儒家经典提供了人们在政治行动时的想象的可能，此或称之为理想。换言之，儒家经典同时是现实的借口与理想的来源。在政治的领域中，儒家学说不只是作为现实政治正当化的工具，也同时提供了儒者在建构政治秩序时“创造性”的来源。如本书讨论汉晋之际，士大夫如何诠释《仪礼·丧服经传》中的“为旧君”的服制。《丧服经传》中的人际关系类型与性质，尤其是君臣关系，提供了汉晋之际的士大夫，在面对“士大夫社会”形成时，建构新形态人际关系的文化资源，而不是只作为既有体制的正当化工具。

过去的研究较强调经典诠释的延续性，即偏向讨论经典中的思想元素间的传承关系，而忽略断裂性的一面。儒学作为一个传统，自有其学说思想的延续性，毋庸置疑。但儒学中的许多概念以语言符号呈现，历代行动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本书试图探讨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出现的原因。如本书中《“制礼”观念的探析》一文，探究儒学中的“制礼”观念，如何从“制定礼仪”，演变到东汉以后的“制定一部礼典”，以及论证其受到汉代讖纬学说的影响。又如《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一文是运用语言诠释的观点，重新探究自秦始皇以来的“皇帝”号的意义，试图指出皇帝号的意义并没有固定于秦始皇议帝号之时，后代之人借由皇帝号意义的诠释，以创造其自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

又，也由于这几年来从事“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计划，有更多机会接触东亚史，包括中、日与中、韩的比较研究。故本书中也收录我在这一年中所撰写的两篇与东亚史有关的论文。这两篇论文仍以中国的皇权为研究焦点，但中国的皇帝制度在当时人的理解中，不是今日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而是一种以中国天子为中心的某种普世帝国。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皇帝制度，而仅限于“一国史”的框架中，以“民族文化”的角度思索皇帝制度中的诸文化内涵，恐怕是对于皇帝制度的误解，也不能令人理解东亚诸政权间的文化交流现象。

总之，本书的主旨是探究唐代以前的皇帝制度中的权力关系，而尝试运用经典诠释的若干角度与方法，并借由礼制等语言符号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即使本书不成熟甚或谬误之处或在所难免，但此研究角度与方法当可带领我们探索过去政治史研究较忽略的一面，或可去除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若干刻板印象。以中国政治史而言，20世纪的中国处在革命与“反传统”的浪潮中，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被界定为恶的事物，是应该被扬弃的对象。在这股风潮中，研究者抱着建立民主政体的信念，只想努力挖掘传统政治中的恶与负面，不可能去同情理解古人的政治行为。或许我们可以平心静气，试着依循历史脉络，从历史中行动者当事人的立场与观点，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过去的“专制论”将传统中国的政治现象或多或少二元

化为“专制的君主相对于被奴役的臣民”，以彰显人民被宰制的事实为史家主要的责任。而此研究取向忽略了历史中的芸芸众生在其社会生活中，如何利用既有的人际关系等社会制度以建构其主体性，一部中国史应是这些芸芸众生在其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借由多元主体互动所创造出来的。

近年来，体力多消耗于教学工作中，虽然也乐在其中。每次看到年轻学子充满知识好奇的眼神，总希望能为他们指出一条新路。我虽好为人师，却力有未逮。但至少在新世纪展开的今天，我们应有意识地反省 20 世纪中国史研究所设下的框架，尤其是那些为了解决当代问题而引入的西方概念，而這些概念可能误导我们理解中国史。即使我指不出一条研究的新路，也应使读者正视历史的复杂性，不是任何既有的理论框架可以完全理解的。愿以此与我的学生们共同努力。

学术之路走来不易，能在其中或悠游，或竞逐，都因有人提携共勉。当我撰写本书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形态》时，我还是一位甫踏出校园的博士，始任教于东吴大学历史系，东吴给了我安定的环境从事教研工作，至今心怀感恩。本书中《西汉郊祀礼的成立》、《〈大唐开元礼〉中的天神观》两章与《中国古代的罪的观念》的部分内容是写成于东京大学的研究室，许多想法是出现在通勤电车上的阅读。感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给了我优质舒适的研究环境，让我能镇日沉思于学术，甚至忘记“终电”时间。东大研究生在我教学中给了我深刻的刺激，使我更有兴趣于中日礼制的比较研究。其他论文都完成于我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时。台大是我的母校，这里的师长、同仁、学生给我的教诲、帮助，更寸纸难书，永铭在心。尤其感谢业师高明士教授。从我是一个懵懂的大学生始，高教授是我的导师，多方启迪。在研究所求学阶段，又在高师门下受教。我能对于礼制与东亚史有若干领悟，都拜高师的谆谆教诲。也感谢“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的研究团队师长同仁，在这几年合作中，让我以更宽广的心胸去认识儒学，并扩展东亚史的视野。团队中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有教我，使我在研究的路上不断受到激励。尤其是黄俊杰老师以其学术典范，鞭策我努力于中日儒学史中的礼学比较研究，给我诸多研究动力，衷心感谢。也借

研究计划合作的机缘,使本书能获选成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刊》之一册,有机会问世,即使有愧于丛书诸负责人的错爱。在本书编辑期间,我的研究助理陈亿芳小姐综揽编务,台大博士班研究生赵立新先生、郑雅如小姐尽心校正原稿,并惠赐高见。诸位之辛劳与厚意,令我感佩,谨志于此,以示谢忱。教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皆抱着感恩之心以对。撰文自序之时,恰逢旧历四十岁生日。已作了“半辈子”的史学,至今仍愿承重担,走远路,只因自觉资质不如人,太多书读不完,太多学问中不解之事,犹待追寻答案。即使自知成就有限,也在此祝祷本书的出版,是我生命的里程碑,象征在学术的路上能“四十而不惑”。

甘怀真

2003年1月8日序于台大历史学系研究室

目 录

再版感言·····	1
自序:兼论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展开·····	3

上篇 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

先秦礼观念再探·····	3
西汉郊祀礼的成立·····	26
“制礼”观念的探析·····	59
魏晋时期的安静观念·····	86
《大唐开元礼》中的天神观·····	131

中篇 政治秩序与经典诠释

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形态·····	151
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	188
从唐律反逆罪看君臣关系的法制化·····	225
中国古代的罪的观念·····	260
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	280
隋朝立国文化政策的形成·····	315

下篇 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

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	341
所谓“东亚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关系为中心·····	362

附 录

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	381
参考书目·····	392
名词索引·····	417

上篇 礼观念的演变与
儒教国家的成立
